

探访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—— 寒光剑影 金声玉振

说到国内热门的博物馆,湖北省博物馆肯定名列其中。它是中央与地方共建的8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之一,现有藏品46万余件(套),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上千件(套),节假日常一票难求。

作为荆楚文化渊藪的殿堂,湖北省博物馆却豪横地用一个300平方米展厅,只展示一件来自吴越文化的文物——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剑”的越王勾践剑。

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到达湖北省博物馆之前,已在不少博物馆看过不同的越王剑,作为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“越王者旨於賜剑”已看过多次。作为越国故都的绍兴也在绍兴博物馆中藏有3柄“越王不光剑”。而前几日在荆州博物馆也近距离观赏过4柄越王剑。

在众多越王中,越王勾践“卧薪尝胆”成功复国的故事,让他成为知名度最高的一位。据《越绝书》记载,越王勾践拥有湛庐、纯钧、胜邪、鱼肠、巨阙5柄由欧冶子精心铸造的绝世宝剑,其中湛庐为五大名剑之首,此剑吹毛断发,削铁如泥。

我们到达时,“越王勾践剑”展厅早已被人潮包围。在一注顶光照射下,薄而长的剑横陈在中央展柜中,历经两千多年,此剑依然锃亮,散发凛冽寒意。盘形剑首装饰有规整密布的同心弦凸纹,剑格处镶嵌的蓝琉璃仿佛隐隐含光的猫眼,剑身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一路向上铺展。近剑格处刻有两行八字鸟篆铭文:越王鸠浅自作用剑。鸠浅,就是越王勾践。

越王剑是长江文化璀璨长河里重要的组成部分,承载着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精湛的冶金、锻造技术,也见证着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相互交融。《庄子·外篇·刻意》记载:“夫有干越之剑者,柙而藏之,不敢用也,宝之至也。”盛产宝剑的浙江龙泉就拜欧冶子为祖师爷,而湖州莫干山名称由来也是为了纪念干将、莫邪两位吴越铸剑大师,这一刻我们与



曾侯乙编钟。

本报记者 彭鹏 摄

那段历史的联结无疑更深了。

湖北省博物馆另一件家喻户晓的重器就是曾侯乙编钟,长7.48米、高2.65米,钟体总重2500多公斤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么庞大、壮观的编钟。编钟囊括钮钟、甬钟等多种钟形。撑起那65件编钟的6个青铜甬钟武士,早已在网络上以表情包的形式传播开来,这让当代人与文物更有趣地联结在一起。

在编钟前打开手机,搜索1978年,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便首次公开演奏的乐曲——《东方红》。当沉睡千年的编钟被今人手执钟槌敲响,清脆的声音携着厚重的历史,庄重优雅地传来。“曾侯乙编钟最神奇的,莫过于一钟双音。”工作人员介绍,敲击一件编钟的正面与侧面,会得到两种不同的声音。这



越王勾践剑与剑上所刻的鸟篆铭文。

本报记者 彭鹏 摄

主要源于它棱状、扁形的合瓦形构造。而悬挂三层、大小不同的钟,也可产生不同的音高。浑铸、分铸;铜焊、铸镶、错金;圆雕、浮雕、阴刻、髹漆彩绘……如此繁复的工艺,在那个没有精密制作仪器的年代,就这么凭着倾泻进模具的铅锡金属液熔铸而成。合瓦的设计、共振的原理,从外到内都让人惊叹古人的辛勤与智慧。

1978年,曾侯乙的墓葬在湖北随县(今随州城区)被发现,其中发掘出土了1.5万余件工艺精湛的文物,这套编钟正是楚惠王赠予曾侯乙的随葬品。钟上刻有的3700字铭文,又在千年后清晰确证着那时有十二个半音的存在。一支钟曲,打破了七声音阶和十二律是由欧洲传入我国的传统认知,改写着华夏音乐史与世界音乐史,并由此印证着当时

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。

从一个不足百里的弹丸小国,到疆域广至“地方五千里”的春秋霸主,要经历什么?对于楚国,答案是长达800年的悉心毕力。在湖北省博物馆的《楚国八百年展》中,与500余件楚国珍宝面对面,我们会为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”“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”的荆楚志气深深动容。

在根据荆州熊家冢遗址复原的、由6匹健硕威猛的奔马组成的“君子六驾塑像”前,我们感受强盛恢弘的泱泱大楚。在楚文化标志性物像虎座凤架鼓鼓前,我们看到凤鸟脚踏两只卧虎引吭高歌,两只小虎足蹬凤背,向鼓而立,感受到楚人奇伟瑰丽的浪漫想象。在“彩绘漆奁”上,我们观赏着我国目前最早的一幅连环画,贵族出行会面时初行、驱驰、出迎、相会、大家奔突的生动场面,巧妙漆绘在展开后全长87.4厘米、宽5.2厘米的圆奁外壁上,战国时古人“居有法则,动有文章”的万千仪态也尽显无疑。

此刻,文物仿佛真正有声:曾有一群人在这片土地耕耘过、创造过、想象过、思考过、奋发过。他们挥舞着宽袍大袖,舞弄着黑与红的漆彩,凤鸟在他们的幻想中振翅腾云,他们邀请凤鸟进入诗篇中,留在器物里。身既死兮神以灵,魂魄毅兮为鬼雄。楚国既灭,但楚魂犹在。

正是这些具体有形的荆楚文化,和难以言状的荆楚志气,让我们在湖北调研期间深深动容。在楚国八百年时间里,勤劳智慧的楚人不仅创造了特色鲜明的青铜器、漆器、玉器、丝绸等物质财富,还孕育出别具风格的老庄哲学、屈宋辞赋、编钟乐舞等精神财富。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、开拓有为的创新精神、博采众长的包容精神,以及九死无悔的爱国精神等代代相传,让荆楚文化成为一滴至为灵动的长江水,随长江东流,源远流长。

(本报记者 葛熔金 高心同)

走进眉山三苏祠—— 年轻人如此喜爱“坡哥”



位于四川眉山市的热门景点三苏祠。

本报记者 张迪 摄

四川眉山市因为一个人扬名世界,他就是苏东坡,中国古代文人中的顶流之一。

从古至今,无数人吟诵他的不朽诗篇,无数人被他的豁达乐观打动,无数人梦想和他有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。

这次,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顺长江而行,从长江之尾来到长江上游,终于来到他的家乡眉山。

这个季节,三苏祠前的银杏树快黄了,它们都600多岁了。那棵葛黄树年纪更大,已经有上千年,如今依然根深叶茂,生生不息,像苏东坡的精神滋养着这片大地。

苏东坡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。这条大江千百年来哺育了无数文人墨客。在中国文学的星空里,苏东坡是其中一颗闪亮的星,照亮无数后辈的心灵。

我想起,那年的苏东坡32岁,离开这里,踏着岷江水,开始宦海生涯,半生流离,至死也没回来过,想必在宦游的日子里,他也很想家。

现在的三苏祠每天人来人往,它早已不只是一座祠堂,更是一座精神殿堂。千百年来,无数人来到这里,拜谒他们崇拜的文化偶像。

四川省苏轼研究会副会长刘清泉告诉我们,整个眉山城都以苏东坡为傲。眉山以三苏文化命名的道路就有100多条,连眉山的城市标志都是东坡头像与瓦当的组合。

东坡大道、东坡竹园、东坡小学、东坡城市湿地公园、“起舞弄清影”的清影路、“欲把西湖比西子”的西子街,走在

苏东坡的家乡,处处皆是他的影子。

刘清泉说,在这里,三苏文化的普及是从娃娃抓起的。学生们从小就读苏东坡的诗文长大,苏东坡由此成为他们人生的第一位导师,这便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。

刚刚退休、曾担任眉州市三苏祠博物馆文物部主任的徐丽说,她从小就喝苏家井里的水,因为她的父亲就在这里上班,长大后,她也留在这里工作,成为一名解说员、研究员,埋头研究三苏文化长达40来年。

徐丽说,这么多年来,看到这里发生很多变化。前几年,她亲历三苏祠大修,对它的保护是越来越好了。有更多年轻人来接她的班,比她更专业。比如翟晓楠,是研究宋代文学的高材生,在这里研究三苏文化5年了。这些年轻的年轻人们,用新的方式,让更多人了解、接受、弘扬三苏文化。

她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。前些天,他们举办三苏文化论坛,邀请美国学者艾朗诺来讲学,视频放在网上,观看量有几千万。他们还开发了三苏文化数据库,点击量已经有几百万。

走访三苏祠的时候,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年轻人对苏东坡、对传统文化的各种现代化表达。

几天前,一名姓丁的广州籍大学生来到这里,给苏东坡写了长达两页的信。我们发现的时候,密密麻麻的字已经被水打湿,笔迹模糊。

“坡哥,你好”,他是这样称呼苏东坡的。他说,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,苏

东坡的那句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”最能开导他。千百年来,诗意和旷达作为苏东坡的文化品格,一直伴随着每一代中国人,时时给人激励和疗愈。他的粉丝遍布世界各地,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,表达他们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感动。

他们送酒、送糖、送花、送捞汁海鲜,苏东坡的雕像前总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食品。他们还给苏东坡写信、写段子,各种花样,既是倾诉,也是隔着时空的对话,可爱而真挚。

在苏东坡诞辰987周年这天,一名内蒙古的“苏粉”不远千里赶到三苏祠,只为在当天向他道一声“生日快乐”。这位“苏粉”,曾在人生逆境中被苏东坡治愈。

一名来自北京的朋友,在一张便签上留言:“东坡先生,泽被万世,感谢您成为照亮我生命的光。”这样的互动,让这座古老的三苏祠增添了活力。

那名丁同学在信的结尾写道:“我四处周游,常常伴随您的脚步。希望在中国大地您的另一个脚印处回见。”

眉山和杭州,分别处于长江的上下游,虽然相隔几千里,我们和苏东坡虽然跨越千年,但是,我们同饮一江水,苏东坡一直就在我们身边。

毕竟,苏东坡在杭州做过“市长”,给我们留下苏堤春晓,留下东坡肉,留下“欲把西湖比西子”的动人诗篇。

如果能够穿越,欢迎你——东坡先生,回到杭州,回来看看江南的秋色,看看你吟咏过的西湖。

(本报记者 史春波)

打卡池州市东至县东流镇—— 体验陶公的松弛感

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地方,在今天安徽池州市东至县的东流镇。东晋时,这里叫“彭泽县”,陶渊明曾在此为官。

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来到东流镇上的老街,发现它还保留着千年前“而无车马喧”的意境。

当我们的无人机飞到高空——黄庭坚的诗句立刻视觉化:“沧江百折来,及此始东流。”

东流镇文化站站长朱泥生告诉我们,《大明一统志》里记载,此地为管钥,“大江自潞城(今九江市)而下,逶迤东注”。浩浩荡荡的长江由江西进入安徽,南岸的第一站就是东流镇。

东流老街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时下流行的“精装古街”:没有时髦的网红店,没有“我在东流很想你”,一副素面朝天的样子。

东西长880米,南北长300米,两条交叉起来的十字街巷上,明清时代的徽派建筑有1000多幢,都有“青砖小瓦马头墙”。原住民仍住在街上,多数做点小生意,还有大量的文化场馆如油画馆、雕塑工作室、戏迷俱乐部,都是前店后坊,闹中取静。

我们正在上百岁老宅楼上看古建筑时,叶江红风风火火地来了。

镇上的干部说,叶老师是最了解东

流古街的人。果然,这位优雅的女士张口就能讲出街上金家、鲍家、高家大屋等百年老宅的格局、主人的故事、历史的变迁。

意犹未尽地听她讲口述史,才知道她的身份其实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南词的传承人,白天游走老街,晚上化身巨角儿,快活得很。

东流人的松弛,在1600多年前就形成了传统。

古街东南面尽头,就是陶公祠。在《归去来兮辞·序》里,陶渊明讲了他为什么要到彭泽做官:摆脱家贫无粮,亲友唠叨。没有别的办法,去当官吧——那个时代的世家子,要“进”,有家世背景可以依赖。那么亲友们就劝他:“家里一屋子孩子(5个儿子),你干嘛不做官啊?”

陶渊明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,不想走远。“彭泽去家百里”,一江之隔,离家不远。关键是“公田之利,足以酿酒。”哎呀,这样的一个小官虽然没有了不起的酬劳,但是会分到田,种了田的收获足够可以酿酒。有酒喝,又不用离家太远,这对陶公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诱惑。“故便求之”,好吧,去吧。

但是彭泽县令一职,也是陶渊明官场生涯的最后一次履新,后面的故事流

传千年:因不堪官场黑暗和腐败,先生解印辞官,归隐田园。“质性自然,非矫厉所得”,做这样的官违背了他的天性,他做不来,不想忍耐,于是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去了。

陶公当年讲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,在正常的环境里,没有“车马喧”,便是没有人情的酬答,不用应对世俗。

我们去“拜访”陶公时,门口那片陶公最爱的菊花田,还没有开花。旁边坐着3桌子打牌、聊天的老人,茶水自备。

东流到处都是这样潇洒飘逸的老百姓。东门城外一户人家院子的墙壁上写着:“野棠花落,又匆匆过了,清明时节。划地东风欺客梦,一枕云屏寒怯。曲岸持觞,垂杨系马,此地曾经别。”这是辛弃疾《念奴娇·书东流村壁》里的词句。

因为田园诗鼻祖陶渊明在东流留下了潇洒飘逸的经历,后世就有很多“迷弟”到东流打卡,颜真卿、陆游、范仲淹、朱熹、梅尧臣、黄庭坚、杨万里都曾流经此地。最出乎意料的,就是辛弃疾。

如今,东流老街向西走到尽头,能够看到辛弃疾先生的汉白玉雕像。这位豪放派词人在东流留下的,是一个与他后来文学形象完全不同的故事——凄美的爱情故事。

词人年轻时路过东流,结识了一位难以忘怀的女子。这回经过此地,故人不再,感发作词:“楼空人去,旧游飞燕能说……旧恨春江流不断,新恨云山千叠。料得明朝,尊前重见,镜里花难折。也应惊问:近来多少华发?”

东流所及之人事,总是至情至性。

当我们走到江边,与叶江红告别,她说她先去接孩子,然后准备晚上去唱戏。这段时间演黄梅戏,她是《女驸马》中的冯素珍,《罗帕记》中的陈赛金。

这是今天东流人日常的节奏。

当地人说,天气晴好时,我们航拍到江边的江豚出没。但是你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游过来,得等。

问题是,你我愿意等吗?

如今听说陶公的菊花已经慢慢盛开了。在一个焦虑的时代,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东流,可能代表着一种特立独行的松弛感。

(本报记者 章咪佳 郑娟)



位于安徽池州市东流镇的陶公祠。

本报记者 杨朝波 摄